

## 比较文学的“普及性”与“精英性”

孟 华

(北京大学 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复兴”(艾田伯语)了的比较文学在中国又走过了30余年的发展道路。30余年来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最明显的标志便是比较文学在中国已享有了“显学”的地位(季羨林先生语),而最直接的成果则是比较文学的基本思想与原则(新人文主义,开放、对话,跨语言、文化、学科)已深入人心。近年来,有论者提出“比较文学消亡论”,其立论的基础就是比较文学的原则已为人文社科学者所普遍认同,故而本学科已无独立存在之必要。我当然不敢苟同此论,但它恰好从一个侧面证实了比较文学在中国的波及面之广,影响力之深。

然而,已过“而立之年”的中国比较文学,恐怕也面临着某些问题和挑战,有些还颇为棘手。诸如研究中使用二、三手材料,导致研究成果低水平重复甚至错误百出;“重言”、“复制”的教科书层出不穷;某些人为标新立异,一味地玩弄新口号、新名词;在博士点申报中,真正有基础、出成果的学校一再落选,而某些弄虚作假者却榜上有名……凡此种种,败坏了比较文学的声誉,甚至威胁到本学科的发展,令人不得不反思本学科的学科定位问题。

事实上,早在“复兴”之初,前辈学者们就已将比较文学定位为一门“精英”学科。1986年,杨周翰先生提出了“提高我们的研究质量”的要求,他再三强调掌握第一手材料的重要性,指出:“作为一个比较文学工作者至少要求掌握两种文学的第一手材料,这是最起码的要求”。<sup>①</sup>乐

黛云教授也援引了美国比较文学家勃洛克的话：“任何领域都不会比比较文学提出更严的要求”，以说明“比较文学的难度”。<sup>②</sup>

那么，比较文学究竟难在何处？恐怕首先和主要的还在于它对跨文化、跨语言基本功力的要求。在中国，这就意味着学者们需要至少掌握好一门外语，并对中外两种文学、文化有较到位的把握。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称其为“精英”学科，绝无否定其“普及性”发展之意。众所周知，举凡做一项事业，初起时总要造声势，创队伍，不如此，便无法使这门学科得以立足。更何况，普及与提高总是相辅相成的，能有一大批具有“比较文学”意识的中学教员，能在我国的大、中学教育中引入“国际”的视野，引发对国际文学与文化交流的兴趣，不仅有助于提高我国的教育质量，而且也可为高层次的比较文学研究提供源源不断的生力军。但继之而来的，恐怕就需在时间及队伍结构两方面对“普及”做一限定了。在时间方面，如前所述，中国比较文学事业早已过了轰轰烈烈的“草创”阶段，30多岁的“人”了，需要“沉潜”，需要耐住寂寞去“上下求索”。学问事本不易，更何况比较文学属于典型的“舶来品”，中国学者若不拿出基于第一手材料的研究及由此生发出来的原创性思考，如何才能真正跻身于世界比较文学之林？至于“队伍结构”，以我之陋见，比较文学队伍自身似可做些分工：大专、中专受条件所限，或许只能以普及为主；但大本以上的教学及科研单位是不是就应将主要力量放在“提高”上？是否就应要求学者严格按照比较文学自身的特质与规律去进行研究？要求学生必须在精通外语、熟读原著（包括作品及理论两个方面）的基础上去学习、思考和讨论？

与此相关联的一个问题是：世界文学专业的设置。

毋庸讳言，世界文学专业是在一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我国自建国至80年代初，懂洋文者寥寥无几，那是当时的国情造成的缺陷，而中高等教育又不可能不介绍外国文学，故而出现了不读原著，只靠译文，甚或只靠某些《外国文学史》的简单介绍去教授、学习外国文学的状况。但现在时代变了，条件变了，专业的设置理应随之而变。别的语种

不好说,至少英语已相当普及,为什么还要让只读译著的现象继续存在下去?为什么不能让精通外语、能读原著的学者承担起此类课程的教学?此外,“世界文学”的概念本身就很模糊,它到底是指歌德主张的那层意思?抑或为“外国文学”的别名?谁也讲不清楚。但无论是哪种情况,这个名称都易产生歧义。我由此主张取消“世界文学”专业,而一律改称“外国文学”,并建议在有条件的地方交由各学校外语系的教师来承担,至于其他与学科建制、评议相关的各项工作也可交由外语院系来统一处理。这样做,或可收一举多得之效:既可提高中国语言文学专业的外国文学教学质量,又可培养学生“原典实证”的思想与方法,还可拓宽外语院系科研的范围与路数,为他们创造向文学研究倾斜、向比较文学倾斜的条件,从而改变某些外语院系较注重语言教学、甚至单纯从事语言教学的局面。

这样一来,就又回到了比较文学的学科定位问题上。

现行的体制是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捆绑在一起,又一起放在“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我以为,这样的设置,在两个层面上都严重危及到了比较文学的生存与发展:

首先,是“世界文学”专业以普及外国文学为宗旨而带来的负面影响。由于与比较文学合于一体,它使人误以为两者是等同的,误以为只需对世界各国文学略有所知即可治比较文学。这就直接违背了比较文学的治学原则,大大降低了其培养标准,因而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上文所述比较文学研究中的种种弊端。

其次,对比较文学学科本身而言,这样的设置更是极大地限制了它的发展。须知,比较文学姓“跨”。若将它强行压在某一国别文学下,就犹如捆绑起它的一条腿,让它单腿蹦。这样的“瘸腿”政策,恰恰与其特性相悖,如何能使其得到应有的发展空间?或许有人会说,国外也有将比较文学与本国文学合并在一个系内的做法。这的确是事实,法国大学就大多采用这种学科设置方法。然而,法国与中国的情况是有很大差别的:在法国,举凡治本国文学者,鲜有不通拉丁文,

不懂古希腊、古罗马文的,那是他们文化有机的组成成分。更何况,欧洲文化基本上同宗同源,文字的差异亦不大,一个法国文学教师,至少也通二、三种外语。显然,我们无法完全套用他们的学科设置办法。基于同样的理由,比较文学似也不宜设在外国文学下,那将同样是一种“瘸腿”政策。

比较文学的跨越性决定了它不应也不能设在任何国别文学的一级学科下,理想的办法是与中国文学、外国文学“平起平坐”。但考虑到眼下国内的具体情况,此种理想的境界似难于在短期内达到。那么,可否就先采纳陈思和教授办比较文学专业的方式?他不受现有学科设置之限,将复旦大学比较文学的大门向全上海开放:首先是打破院系的阻隔,从外语系聘请兼职教授;然后又打破学校的阻隔,从上海外国语大学聘请兼职教授。这种“打通”的办法是我目前所见国内最符合比较文学学科发展的模式。如此一来,比较文学就成为了既与中国文学、外国文学相连,又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学科。

我愿借此机会再次向北大的吴志攀副校长、向教育部的有关领导们再进一言:请推广陈思和教授的经验,至少在目前采纳这种“打通”的策略!而且可否考虑将比较文学的门开得再大一点:允许我们在全国,甚至全球范围内,聘请所需的中、短期讲学教授(当然,要有相应的经费及各种硬件的支持)?否则,属于“精英”学科的比较文学就难以在中国有大的作为,甚或有可能被现行的条条框框窒息而亡。事实上,现行的学科设置有许多不尽合理之处,有些已成为学科发展的桎梏。我们这些工作在教学科研第一线的教师们,热切希望学校、教育部的各级领导减少名目繁多、颇有些文牍主义色彩的评定,少让我们去填那些费时费力、只对行政机构统计数字有用的无穷尽的表格,而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实际的学科建设上。

中国正在走前人(包括外国人)没有走过的道路,中国的比较文学事业也正在进入一个向纵深发展的阶段。我们北大、复旦两校连续两年举办比较文学论坛,正显示了我们两校领导对比较文学学科的重视。

但重视不等于就没有问题,况且出现种种问题、遇到各种困难也是发展中的正常情况。我们体谅领导们的困难,信任他们的能力,进言献计,正是为了在学科建设中也略尽我们的绵薄之力。

注:

- ① 《国际比较文学研究的动向》,载《中国比较文学年鉴》,北大出版社 1986 年,第 6—7 页。
- ② 《中国比较文学的现状与前景》,出处同上,第 21 页。

## 莫使“泛滥”必“成灾”

刘 东

(北京大学 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

孟华教授在发言中强调,比较文学只是一门非常边缘和精英的学科,这是非常要紧的和切中时弊的意见。以我本人的治学经历,也许更能体会这种说法的重要性。我此生本来惟以“思想”二字为尚,谈不上也不愿躲进什么具体的专业分工里偷思想的懒,但不知怎么阴差阳错地,居然也算有过两次从事的“专业”,第一次是所谓的“美学”,第二次则是所谓的“比较”(所以我目前正在北大提倡“比较美学”)。而巧得很,这两个专业又都很能吸引眼球,简直能把群众运动都给鼓动起来,所以在热闹非凡之余,反而又有可能失望地发现,一旦惹出了“村村点火”的跃进状态,便很难再区分真学问和假学问,甚至有可能出现康德曾在《导论》中描述过的“形而上学”的窘境——

它的追随者们已经东零西散,自信有足够的的能力在其他科学上发挥才能的人们谁也不愿意拿自己的名誉在这上面冒险。而一些不学无

## 第二届“北大—复旦比较文学 学术论坛”笔谈

---

**编者按：**2003年9月25—26日，第二届“北大—复旦比较文学学术论坛”在复旦大学举行。两校比较文学教师相聚一堂，结合近年来比较文学学科发展的最新形势，共同探讨了比较文学的学科界限和学科身份、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两者的关系，以及当前学科发展的新的增长点。两校学者并在上次论坛的基础上，围绕比较文学学科必读书目的选定、学科教学培养模式、以及北大—复旦两校学术交流机制及建立相关网页链接事宜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深入具体的探讨。会议期间，北大比较文学研究所的全体教师还就比较文学的学科特性以及在比较文学教学中师生间的互动关系等问题与复旦大学的研究生进行了对话。

本刊将分两期发表两校学者的有关发言和他们推荐的比较文学学科参考书目。

**Editor's Note:** The second "PKU-FDU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ymposium" was held in Fu Dan University on November 25 and 26, 2003. The experts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from these two schools discussed the course limit and identity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world literature, and up-to-date tendenc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course. On the basis of the last symposium, they continued the questions of the selection of necessary books for the students of this course, of teaching patterns, of the operation of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se two schools in this field and the creation of their own home pages, etc. During the meeting, all the teachers from the Institute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of Beijing University met the graduate students from Fu Dan University, answering their questions about the cours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interaction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class.

Some speeches and the booklist selected at this meeting will be published in this magazine in two issues.